

「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Shaping the Modern N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革命的底層動員： 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

王奇生

主辦：國史館 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

協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

地點：國史館臺北辦公室（臺北市長沙街一段 2 號）

8-A-1

革命的底層動員： 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

王奇生*

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

——蔡和森，1927¹

一、引言

20世紀的中共革命，幾乎以「群眾運動」貫徹始終，無論是在革命奪權階段還是在執政以後的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群眾運動」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研究中共革命，不能不探究其「群眾運動」。長期以來，中國主流史學的相關研究，多著眼於闡釋黨的群眾路線和描述群眾運動的過程，而對群眾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卻少有探討。黨如何動員？群眾如何參與？黨的政治動員策略與群眾集體行動的自主性邏輯之間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互動關係？持續數十年的群眾運動，是否形成了一以貫之且獨具特色的運動模式，而在不同時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點？諸如此類的問題均值得深入探討。相比之下，海外學界對中共的群眾動員有過相當熱烈而深入的研究，而其基本關懷在探尋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或毛時代群眾動員的「非凡」性機制。亦因為此，其相關研究，尤多注目延安時期至文革時期，甚至將1949年以後的革命模式，歸之為「延安道路」的產物。相對而言，中共早期即陳獨

*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¹ 《羅義、譚平山、蔡和森在省黨部歡迎會上之演講詞》（1927年4月1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頁。

秀時代的群眾運動，雖也不乏出色的探討，似未得到同等的重視，或者說，學界可能整體低估了陳獨秀時代在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我們知道，在 1921—1927 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裏，中共成長為一個擁有近 5.8 萬黨員，3.7 萬團員的組織，還有在其領導下的 290 餘萬工會會員、900 餘萬農會會員和 15 萬童子團，其組織觸角輻射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和各階層民眾。²從工、農、學，到青、少、婦，如此範圍廣泛、規模宏大的群眾，在短時間內被納入到現代政黨的組織體系中並有效動員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時代，中共沒有掌握政權和軍隊，幾乎全心全意致力於群眾運動。換言之，陳獨秀時代的共產黨是一個沒有武力、沒有地盤、純粹以宣傳組織動員群眾為目標的革命黨。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眾運動的基本模式與路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積累了豐富的策略、經驗與技巧，也養成了一些難以克服的流弊與困擾，並在此後數十年的群眾運動中反復呈現。因此，探究中共的群眾運動，先有必要追溯陳獨秀時代群眾運動的起源及其機制。

陳獨秀時代的群眾運動，涉及工運、農運、學運、婦運等諸多方面。本文無法全面探討，僅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進行一些概略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且無法作全面的史實重建，更無意「顛覆」前人的相關研究結論，只是試圖在前輩學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關注過去被無意忽略或被有意遮蔽的某些面相。因廣東和湖南兩省農運相對比較發達，且留下較為豐富的資料，故本文的討論將以粵湘兩省為中心展開。

二、群眾「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

在一般社會學家看來，群眾是一群缺乏同質性的「烏合之眾」，要將其組織動員起來並加入到集體行動之中，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工程。相對於城市工人和青年學生，鄉村農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後，要將其動員起來更為不易。撒母耳·P·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分析過諸多國家的歷史案例，指出「革命之所以很少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知識份子與農民難以並行。」「形成革命聯盟的障

²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1 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 年，第 10—12 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67 頁。

礙來自於這兩個集團在背景、觀點和目標上的差異。一方是城市的、中產或中上層階級的、受過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識份子，另一方是鄉村的、落後的、不識字的、文化上屬傳統型的、地方性的農民。雙方之間存在的社會鴻溝，其差距之大不亞於人們都能夠想像的任何兩個社會集團之間所存在的距離。他們之間的溝通與理解是一個極大的問題。」³

中共最初也有同樣的顧慮。1923年，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稱：根據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文明程度，只能進行國民革命。中國7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農民的發展水準很低，把農民吸引到國民革命運動中來不是輕而易舉的事。⁴中共廣東區委在1926年的一份報告中也認為農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點影響其參加革命：（一）不能集中；（二）地方主義色彩濃厚；（三）迷信很強；（四）自信力薄弱；（五）民族觀念很深；（六）家族主義的關係和觀念很強固。並指出「這六個弱點，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礙，有其一便不能革命。農民是天生有這六種弱點，所以要農民起來革命，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⁵

中共早年的顧慮，至今仍為很多研究中共革命的學者所認同。如有學者指出：「中國革命是一組反差強烈的因素的產物：一方面是幾乎不識字或很少識字，許多人甚至連縣城也沒有去過的農民大眾，另一方面則是由共產主義精英所宣導的宏大意識形態和改造社會的巨大工程。」⁶也就是說，中共要將高遠的意識形態與愚昧保守的底層農民發生互動，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

亦因為此，中共依靠農民進行革命並最終取得勝利，長期被認為是一個不解之謎，也一直成為西方學界反覆探討的問題。在眾多的解讀中，最具影響力的解釋有二：一是中共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了農民最迫切的實際問題。農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來。二是日本人的入侵，為中共在農村組織發動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黃金機會。換言之，共產黨利用了農民因日本侵略而激發起來的民族情感，是民族主義

³ 撒母耳·P·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第275—276頁。

⁴ 《陳獨秀給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261頁。

⁵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6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頁。

⁶ 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仲介機制》，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輯，第505頁。

而不是社會主義成爲中共與農民團結起來的關鍵。⁷

對於前者，早在 1923 年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以及青年共產國際給青年團中央的指示中，就有相似的看法：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必須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使農民感到有好處後，才能吸引其參加革命，並吸引其參加捍衛這些成果的鬥爭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⁸在共產國際最初的認知中，要發動農民起來革命，必須通過物質利益的驅使，而對農民來說，土地無疑是最大的物質利益。

然而，中共早期的農民運動，實際呈現出一些出乎預料的面相：一，中共在人員極少、時間極短的情況下，將數百萬農民發動並組織起來。二是直至 1927 年 7 月國共分裂，中共中央一直未將土地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也就是說，影響 40 年代中共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前述兩大關鍵因素，在 1927 年以前基本都不具備。國民革命雖以「打倒帝國主義」爲訴求，但 1920 年代其實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最和緩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共雖然以「五卅慘案」爲契機，在城市發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反帝愛國運動，而在農村，農民運動顯然沒有借助民族主義的東風。

然而，1920 年代的農民運動，其規模與聲勢，已是相當可觀。

1921 年 9 月，沈定一在浙江蕭山最早發起農民運動，僅一兩個月時間，即有蕭山、紹興、上虞三縣 80 多個村莊相率建立農民協會，共有 10 餘萬農民被動員起來。⁹

1922 年 5 月，彭湃在廣東海豐開展農民運動，「初時農民尚不相信彭湃，後來農民之趨農會，恍如二十年前鄉人之趨向天主教。」「農會的發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一年中，其運動區域由一、二鄉擴大至五、六縣，其加入員數由數十人增加到二十餘萬人。進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¹⁰

⁷ 馬克·賽爾登對西方學界自 20 世紀 40 年代至 90 年代有關中共革命的研究，作過一個很好的學術總結。見氏著《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中文版「後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268—269 頁。

⁸ 《布哈林對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1923 年 5 月）、《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信》（1923 年 5 月），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第 254—257 頁。

⁹ 中共浙江省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中共蕭山縣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衙前農民運動》，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7 年，第 1 頁。

¹⁰ 李春濤：《海豐農民運動及其指導者彭湃》（1923 年 11 月 7 日），中共海豐縣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陸

沈定一和彭湃雖然均是中共早期黨員，但他們最初開展農民運動時，均是以個人之力自發進行的。兩地的農民運動雖然沒有維持多久就被鎮壓下去了，但從農運的過程來看，在短時間內將眾多農民動員起來，則是確定無疑的。

至於全國性的農民運動，隨著 1924 年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以及 1926 年北伐戰爭的推進而風起雲湧。在短暫的兩三年間，農民運動相繼在全國 17 個省區大範圍展開。到 1927 年 6 月，全國有 5 個省（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成立了省農民協會，201 個縣成立了縣農民協會，會員總數超過 900 萬。¹¹

1927 年 7 月，國共關係徹底破裂，農民運動隨之消沉。從中共的立場而言，國民革命宣告失敗。中國主流史學對 20 年代國民革命的看法，一直籠罩在「失敗史觀」之下。研究者的興趣聚焦於尋找革命「失敗」的原因，而對革命「成功」的一面往往視而不見。在農民運動問題上，最終歸咎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沒有解決土地問題而導致失敗。改革開放以後，學界又將早期農民運動的左傾「過火」視為文革群眾暴力之源，轉向另外一種「失敗史觀」。其實，如果換一角度觀察，一個成立僅五六年的政黨，在兩三年間，能夠發動如此規模宏大的農民運動，堪稱是一大奇跡。而探尋奇跡的內在機制，比追究革命「失敗」的責任，可能更具有歷史學的意義。

1926 年，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說過這樣一段話：「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¹²這雖有革命者自我鼓氣的成份，但也反映了當時很多中共黨人普遍存在的一種自信心態。五卅運動是中共領導的第一場具有全國性規模和影響的城市群眾運動。是時的中共還是一個不足 4 年黨齡、不足千名黨員的小黨。黨員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沒有發動和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經驗。而五卅運動竟轟轟烈烈並且持續達數月之久。中共黨人由此覺得動員群眾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難，群眾其實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這一看法，同樣也適用於隨後而起的農民運動。1926 年，中共廣東區委在向中共中央彙報廣東

豐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海陸豐革命史料（1920—1927）》第 1 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91、119、123 頁。

¹¹ 曾憲林、譚克繩主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農民運動史》，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265 頁。

¹² 惲代英：《五卅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7、17 頁。

農民運動時即聲稱：

我們現在到農村裏去宣傳時，往往不到半點鐘便可以使他們成立農民協會。

13

當然，農民容易動員起來，並不意味著農民運動的發動，無需任何主客觀條件。彭湃對其在海豐發動農民運動的實踐過程，尤其對最初發動農民運動之艱難，作過細緻的描述。¹⁴然而相隔 4 年後中央農運特派員下鄉發動農民運動時，「不到半點鐘便可以使他們成立農民協會」，情形似乎大變。中共廣東區委將後者歸之于「農民痛苦的自覺」。其實 20 年代廣東農村的社會經濟情形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突變的只是政治。

三、政治生態環境與農運的興衰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國民黨控制的南方數省，加入國民黨的中共一方面可以打著國民黨的旗幟公開活動，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政黨的獨立性而合法存在，有點類似參政黨。但中共沒有自己的地盤，沒有自主控制的局部政權，又似在野黨。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共領導的群眾運動，與 1927 年以後的蘇區、根據地和 1949 年執政以後的群眾運動，其政治處境均大為不同。1949 年以後固不用說，即使在蘇區和抗日根據地，中共的群眾運動（主要是農民運動）一般是在自己控制的地盤內開展的。而這一點恰恰是很多研究中共群眾運動的學者所忽略的。實際上，群眾運動的開展，與政治生態環境密切相關。

國民黨在 1924 年改組以前，基本上是一個以知識精英為主的政治集團，非常有限的一點群眾基礎，不是會黨，就是海外華僑，與中國國內絕大多數民眾幾乎不生關係。直至 1924 年改組後，國民黨才開始重視民眾運動。國民黨「一大」後，中央黨部先後設立了農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婦女部和商人部，作為領導民眾運動的機構。工運、農運計畫及相關的政策法規也相繼出臺。然而一般國民黨人多不願從事下層民眾運動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團員來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合作的形態，逐漸呈現出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

¹³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 54 頁。

¹⁴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海陸豐革命史料（1920—1927）》第 1 輯，第 127—215 頁。

的分工格局。¹⁵對於民眾運動，國民黨側重自上而下，以法令政策來推行；共產黨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黨員團員下基層動員群眾。

具體到農民運動，中共廣東區委在廣東農民運動的內部報告中，有過這樣一段描述，大體反映了 20 年代國共兩黨的關係：

許多人固然要說有了國民黨的改組，國民黨規定了農民運動的政策後，所以農民運動才有長足的進步。但是……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的特派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們同志。我們實際做了農民運動，把名譽送給國民黨，可以說是我們成功不居，若是我們不去做農民運動，所謂農民協會不知道現在還在什麼地方。¹⁶

現在從表面看，廣東農民運動，好像是國民黨的工作，做好了是國民黨的名譽，但是自從農民運動起首直到現在，都是我們同志做實際工作。換句話來說，就是廣東農民運動的實際責任是我們同志負擔，名譽卻完完全全送給國民黨去了。¹⁷

北伐以前，從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省農民協會，到各縣的農會和農運特派員，實際均受中共廣東區委的領導。

這個時期，中共的農民運動不僅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也主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農民運動雖然涉及 17 個省區，重點其實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數省。中共承認，「在國民黨統治之下，農民得到了相當的自由能夠公開組織，……這實是農民運動興起的一個原因。」¹⁸很明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是國統區的農民，非國統區的農運因政治環境不良而相對艱難。

落實到具體時空，政治生態環境對農運的影響更為清晰。韓國學者柳鏞泰專門就 20 年代兩湖與廣東的農運進行過比較研究。他根據 1927 年 6 月全國農會會員的統計數字，觀察到省際之間的巨大差異：湖南有 450 萬，湖北有 280 萬，而廣東只

¹⁵ 1927 年 2 月 24 日，顧孟餘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會上感慨說：「現在可有一種危險，是國民黨差不多專做上層的工作，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是國民黨的同志多。至於下層的民眾運動，國民黨員參加的少，共產黨員參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種畸形的發展，很像國民黨是在朝黨，共產黨是在野黨的樣子。」顧孟餘：《武漢二屆三中全會提案大綱之說明》，載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臺北，正中書局 1981 年，第 111 頁。

¹⁶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 55 頁。

¹⁷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 104—105 頁。

¹⁸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 55 頁。

有 80 萬。¹⁹他據此提出疑問：廣東在國共合作下最先受到黨政軍的支援，農民協會首先在廣東成立，但為什麼兩湖的農運規模反而超過廣東？他非常敏銳地注意到廣東公田比兩湖多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以族田為主的公田多，在此基礎上的宗族勢力強大，民團武力發達，從而妨礙農民協會的組織。²⁰不過，他忽視了另一個關鍵因素，即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對廣東與兩湖地區農運的影響。

柳鏞泰只注意到 1927 年 6 月的農運統計數字，如果對比 1926 年 6 月的農運統計數字（見表），就會發現，1926 年 6 月廣東農會會員人數已達 64 萬多人，而湖南只有 3 萬 8 千人，湖北只有 4 千餘人。也就是說，在北伐出師前，廣東是全國農運的中心區域。北伐開始後，農運的地域格局才發生變化，而這一變化，從地域社會經濟結構上是難以解釋的。因為一個地域的社會經濟結構是長期形成的，且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突變。關鍵的影響因數還是政治。

部分省區農會會員統計

省名	1926 年 6 月		1927 年 6 月	
	會員數	占全國百分比	會員數	占全國百分比
廣東	647,766	66.0	700,000	7.6
湖南	38,150	3.9	4,517,140	49.4
湖北	4,120	0.4	2,502,600	27.3
全國	981,442	100	9,153,093	100

資料來源：根據《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的兩個統計》綜合製作，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1983 年，第 65—66 頁。

註 1：1927 年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的總數，不包含江蘇，江蘇約有會員二三十萬。

註 2：各省農會會員統計數，因資料來源不同而有差異。如湖南農會會員數 1927 年 5 月就有 600 萬、500 餘萬等不同的說法。見《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35、40 頁。

廣東作為國民黨改組後的革命根據地和首善之區，在北伐出師以前是國民黨所能控制的主要地盤。這一階段，國民黨「對於農民運動之工作，幾注全力以宣傳組織廣東一省之農民。」²¹國民黨「扶助」農民運動的政策，為中共在廣東開展農民

¹⁹ 湖北、廣東的數字，因統計來源不同而與正文表內數字有出入。

²⁰ 柳鏞泰：《國民革命時期公產、公堂問題——兩湖與廣東農民運動之比較》，《民國研究》（南京大學學報特輯）總第 5 輯（1999 年），第 5—20 頁。

²¹ 《中國農民運動近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編印，1926 年 10 月，第 3 頁。

運動提供了政治保障。基於此，北伐以前廣東成爲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區域自不難理解。問題是，1926年7月北伐開始後，在兩湖農運隨軍事的推進而迅猛發展時，廣東的農運爲何停滯不前了？

北伐之初，中共廣東區委即注意到：「現在北伐了，廣東既已統一，所以國民黨左派並不需要廣東的農運了，只需要北伐道上的農運了。」²²也就是說，國民黨「扶助」農民運動，具有明確的現實政治考量：北伐以前，國民黨需要借助廣東農民的力量平定商團叛亂、東征和統一廣東；北伐開始後，廣東成爲後方基地，國民黨需要廣東政治安定和提供財政支持，加之留守廣東的軍政勢力多爲國民黨右派，因之廣東農運在北伐開始後不僅沒有隨著革命形勢而高漲，反而遭到抑制而低落。²³

一般認爲，農民對政治麻木、冷漠。其實農民並非沒有政治嗅覺。他們對農會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隨政治與軍事局勢的變化而波動。1926年10月，一位農運特派員在一份關於廣東清遠農民運動的報告中寫道：清遠農運完全以政治形勢的變化爲轉移，最初因得到省政府的幫助和縣政府的扶植，「一般農友皆以依賴政府之心而興起，不特農民，如一般土豪劣紳，亦變相而混入農會，爲自救而投機，風聲所播，不一月而組織甚眾。」後因縣長更動，新上任的縣長對農會的態度消極，革命軍大部分離粵北伐，隨後又傳來北伐軍在長沙受挫的消息，土豪劣紳趁機造謠，農民因之恐懼，農會也大爲動搖。「鄉民疑慮非常，欲加入協會者，亦遲徊觀望。」²⁴廣東清遠農民對農會的態度，明顯受到政局變化和北伐軍事進程的影響。類似的情形其實很普遍。與農民相比，地主紳士更是見風使舵：「農會初成立時，一般紳士都說農會的壞話，後來農會發展了，他們又想投機加入農會。」²⁵各地都有類似的情形。

隨著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湖南、湖北相繼成爲國民黨的統治地盤。國民政府也於1927年1月由廣州遷至武漢。湖北成爲國民革命的中心區域。不過，在1927年上半年，無論是農會會員人數，還是農運的實際聲勢，湖南都明顯超過了湖北。從某種意義可以說，湖南農運是超常發展。這種超常發展的原因雖然複雜，而政治

²²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99頁。

²³ 有關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的研究，可參閱梁尚賢：《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之崛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鄭建生：《動員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1922—1927）》，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²⁴ 黃克：《清遠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10月20日），臺北國民黨黨史館藏，五部檔，卷號：部11466。

²⁵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79頁。

生態環境仍是關鍵所在。

清末以來，湖南有維新、革命的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湖南是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20年代初期，趙恆惕打著「湘省自治」的招牌，湖南的政治環境一度比較寬鬆，為中共黨團活動提供了相對便利條件。²⁶其後，趙恆惕於1925年3月被迫出走，唐生智主政。唐氏為鞏固權位，傾向廣東國民政府，1926年北伐軍入湘並克復湖南後，以唐生智為首的省政當局，與中共形成了相當良好的互動關係，對於群眾運動也採取比較開明的態度，從而為工農運動提供了國內少有的政治空間。

而唐生智之所以與中共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甚至有意「迎合」中共，又與中共在湖南的強勢有關。陳獨秀時代，湖南是中共力量最強大的地區之一。²⁷1924年國民黨改組前，湖南的國民黨組織早已蕩然無存，是中共湖南區委幫助國民黨重建了省黨部。²⁸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以前，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實際由中共「包辦」。中山艦事件以後，中共「怕當主人，認為當了主人就將破壞聯合戰線」，有意「讓位」，「有意扶植國民黨出來執政」。²⁹無奈國民黨左派一時無法自立，故湖南的國民黨省黨部和多數縣黨部實際仍由中共主導。國民黨省黨部派赴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也大多是中共黨員。³⁰湖南幾乎成了中共的天下。李維漢在1923—1927年間擔任中共湖南區委主要領導職務。他在晚年回憶錄中說，北伐時期，中共湖南區委的政治主張，主要通過國民黨省黨部推動省政府去實施。³¹亦因為此，「湖南的國民黨，在北伐期間好像是整個的左傾。」³²

²⁶ 1923年，鄧中夏就注意到，就全國政治環境而言，湖南和北京相對比較自由。見《鄧中夏關於中校移粵及北京革命形勢活動意見等問題給國昌諸同志的信》（1923年12月16日），載《北京革命歷史檔案集》第1集，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編印，1991年，第32頁。

²⁷ 據1927年5月的統計，中共黨員總數為57967人，其中湖南有20000人，約占35%；全國團員總數37638人，其中湖南有7080人，約占19%。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39、398、45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7頁。

²⁸ 《湖南省黨務報告》，見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3年，第16—17頁。

²⁹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125頁。

³⁰ 如1927年《中共湘區一月份農民運動報告》稱：“最近民省部派出之農運工作人【員】共計203人，其中本校（引注：指本黨）182人，民校（引注：指國民黨）21人。見《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458頁。

³¹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85頁。

³² 李維漢：《湖南革命的出路》（1927年4月），《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351頁。

北伐時期，唐生智的思想相當左傾³³，在其影響下，湖南省政府的核心幹部亦多左傾，積極支援工農運動。按後來國民黨方面的說法，「唐生智既要藉共黨為護符，當然要設法逢迎其領袖，乃特派其最親信與最長於拍馬之一員良將鄧壽荃，專司其事。時鄧長湘省建廳，金融充裕，尤便工作。」³⁴「唐生智離湘督師，將主席職務，交由張翼鵬代理。張一介武夫，素無政治頭腦，幸當時湘省政治，悉為共黨主持，一切設施，張皆順承其意旨而行。」³⁴湖南省政府及所屬各廳如建設廳、民政廳、高等檢察廳等均先後下達訓令和通告，要求各地行政官吏切實保護農工利益和支持農民運動。³⁵省政府建設廳還月撥經費 3 千元給省農協，另批 2 萬元在各縣辦農民訓練班。省農民部月准農運費 4 千元，各縣署另撥給縣農協每月 100 至 300 元不等。³⁶唐在湖南各縣市的留守部隊對工農運動亦採取不干涉的中立態度。³⁷另據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1927 年 4 月 18 日，湖南省黨部派了三個代表到武漢向中政會報告說：「（土地問題）省黨部同省政府曾經為此事討論過多少次，結論是要將一切土地收歸國有，不過收歸的時期同收歸的辦法還沒有決定。」³⁸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與省政府在全國率先作出土地收歸國有的決策，雖然未能付諸實踐，但足可見其激進程度。下麵這段話，引自 1927 年 4 月發表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剷除反革命派宣言》，言詞與觀念之激烈，更可見一斑：

革命派與反革命派，勢不兩立，不是革命派推翻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推翻革命派。這是事實與歷史的證明，絕無否認之餘地。如果革命派與反革命派調和、妥協，便是革命派向反革命派投降，革命二字便會不榮譽的宣佈死刑。因為革命字典中只有「爭鬥」、「徹底」等字眼，絕對找不出「調和」、「妥

³³ 在當時中共一般的認知中，唐生智被定為“中派”，而李維漢晚年認為唐生智是“中左”（見《回憶與研究》（上），第 138 頁），而筆者從這一時期唐生智的大量言行判斷，完全可以將其定為“左派”。當時有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即認為唐“甚左”，見《農所學生鄧良生致陳克文函》（1927 年 2 月 12 日），臺北國民黨黨史館藏，五部檔，卷號：部 11552。

³⁴ 湘民：《馬日事變以前之湖南》，《社會新聞》1932 年第 1 卷第 16 期，第 351、371 頁。

³⁵ 《省政府對於農民運動的宣言》（1926 年 8 月）、《湖南建設廳保護農運之通告》（1926 年 9 月）、《湖南省政府轉發國民黨中央訓令》（1926 年 11 月）、《湖南省高等檢察廳訓令》（1926 年 11 月）、《民政廳切實保護農工訓令》（1927 年 1 月），均載《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204—212 頁。

³⁶ 《湘區書記報告》（1926 年 10 月 22 日），《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93 頁。

³⁷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 85—87 頁。

³⁸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速記錄》（1927 年 4 月 18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第 1063 頁。

協」等壞名詞。基於上述理論，是革命派打倒反革命派，為革命過程中一種必然的手段。「我不打倒敵人，敵人必打倒我」，「對反革命派姑息，便是對革命殘忍」。革命的手段，原來是如此的。³⁹

正是中共在湖南的強勢，及其影響下的國民黨省黨部、省政府和唐生智的左傾，為工農群眾運動的開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和難得的政治機會。這是湖南政治生態的獨特之處，也是湖南農運超常發展的關鍵所在。1927年5月馬日事變後，轟轟烈烈的湖南農運一落千丈，同樣是因為留守軍官的政變、唐生智的轉向與湖南政治環境惡化的直接結果。

群眾運動的興衰，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在適宜的政治環境下，群眾運動很容易號召起來。「奉旨革命」更是如此。同樣，多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經不起強權、武力的摧折。這幾乎是所有群眾運動的一個基本特性。1927年以後中共的群眾運動，是在其直接控制下的蘇區和根據地進行，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動員不足，而是動員過度。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後的群眾運動更是如此。無論是局部地盤，還是全國性政權，以革命黨兼執政黨的力量發動群眾運動，群眾或為政治參與激情所吸引，或為「奉旨革命」的利益所誘惑，或為政治環境的壓力所驅使，很容易形成「過度動員」的局面。⁴⁰

四、農運講習所與特派員機制

無論是沈定一，還是彭湃，他倆最初在各自家鄉開展農民運動時，充分利用其在地方社會的精英身份、家庭地位，以及熟人社會的人脈關係和人際網路。不少學者發現，中共革命初期，各地革命者均有類似的情況。不過，每個人在其家鄉熟人社會的圈子畢竟是有限的，當革命的範圍一旦擴大，熟人社會的圈子勢必被突破。理論上講，熟人又有熟人，可以一波一波地不斷擴大和不斷複製，但當群眾運動需要於短時間內在一省或數省範圍內大規模展開的時候，這樣一種熟人網路模式顯然太過緩慢。彭湃顯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在海豐發動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最感需要的是領導農運的人才。當他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後，首先建議創辦農民運

³⁹ 《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剷除反革命派宣言》（1927年4月），《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259頁。

⁴⁰ 中共在蘇區和根據地的“過度動員”現象，擬另文探討。

動講習所，「批量」培養農運人才。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其效率大大超過個體的熟人網路模式。學員在講習所經過短期培訓後，部分任命為中央農運特派員，部分分遣回原籍開展農運。這看似複製彭湃模式，但從這些農運特派員的下鄉經歷來看，他們回到本籍所在縣以後，除了他自己所在的村莊有熟人關係可以利用外，對縣內的大部分鄉村其實仍是陌生的。那時一個縣的範圍相當大（1949年以後很多縣被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三），交通條件又極差，人際交往範圍非常有限。他們在一縣之內宣傳和調查時，其實很少有人脈關係可資利用。有時鄉土關係也可能形成阻力。如一位農運特派員在自己家鄉開展農運時，反而遭到其本族頭面人物的責罵和毆打，「並行其專制家族主義」，以將其「出族」相威脅。⁴¹

另一方面，農講所學員大多出身中下家庭，個人資歷淺。廣州農講所的學員入學資格：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身體強壯，勤敏忠實，無惡劣嗜好，在中學畢業及有相當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屆不限中學卒業，凡農民協會會員，或佃農子弟均一律錄取，並聲明不收田主及紳士的子弟。⁴²

第一屆學員，中學畢業者居多，還算得上「半知識份子」。第二屆以後，學生的比例減少，農工的比例增大。第三屆 128 名學員中，佃農 72 人，自耕農 20 人，鄉村學生 29 人，工人 4 人，小商人 1 人，軍人 2 人。⁴³農民占到 72%。即使是學生，也「取材于純粹農民子弟」⁴⁴，明確聲明「不收田主及紳士的子弟」。這顯然是受中共階級觀念的影響。

然而，農講所學員以這樣的家庭出身和個人資歷，受訓回鄉後，其實很難贏得底層農民的信仰。在鄉土社會，地方精英的身份地位，絕對建立在家庭經濟及個人學識道德基礎之上。即使是貧苦農民，他們一致信仰當地有名望的紳士，而相互之間則未必瞧得起。一位親身經歷者憶述：「當時我們動員的物件是長工、使女、女工以及肩挑小販和貧苦漁民、船夫和靠打柴為生的等。可是這些人之中，有的很多顧慮，一般要看當地有信譽的農民的行動以為轉移，因此鄉農協成立以後，所選任

⁴¹ 李定一、李萬蒼：《鶴、新、開、台四邑各鄉調查經過情形》（1926年7月14日），臺北國民黨黨史館藏，五部檔，卷號：部 11454。

⁴² 《農運講習所報告》，臺北國民黨黨史館藏，五部檔，卷號：部 1132。

⁴³ 《第三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63 頁。

⁴⁴ 《第一至五屆農講所總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第 35 頁。

的委員長，多半是農民中有地位的人，真正的貧雇農不多。」⁴⁵中共番禺縣委在給廣東省委的報告中亦談到：「當地貧苦農民往往做事都是要大耕家帶頭，他們乃敢隨之。他們依賴大耕家的心理，非常難以打破。」⁴⁶

這是一個兩難的吊詭。站在中共的階級立場，農民運動必須以底層的貧雇農為中心，然而，真正的貧雇農無法得到農民的信仰。貧雇農之間也相互輕視。早期中共黨團員多為受過中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⁴⁷沈定一、彭湃開展農民運動時，正是利用其家庭地位、個人資歷以及與當地上層精英的關係。沈家是浙江蕭山縣最大的富豪之一，沈定一的父親是前清進士，沈定一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清末時擔任過知縣，民初當選為浙江省議會議員、議長。⁴⁸彭湃自稱其家庭是海豐縣的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餘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餘人。⁴⁹彭湃本人留日歸來後，一度擔任海豐縣教育局長，與陳炯明等軍政人物亦有相當的人脈關係。很顯然，沈定一和彭湃兩人在當地社會的家庭地位和影響力，是「純粹農家子弟」出身的農運特派員所望塵莫及的，也是無法複製的。

雖然如此，農運特派員在 20 年代的農民運動中仍發揮了重要作用。農運特派員雖然不具有沈定一和彭湃那樣的鄉土社會地位和人脈，但他們或由國民黨中央委派，或由省黨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黨部的權威，以「特派員」的身份為護符，不僅對普通農民具有相當的權威和號召力，也使地方當局和豪紳有所畏懼和顧忌。中共廣東區委就批評農運特派員「時常拿上司的面孔去對付農民，把自己變成衙門委員一個樣子。」「過於依靠政治力量工作」，「以為省農會的特派員是同縣公署的委員一樣」。⁵⁰廣東區委還提到，農運特派員「往往到農村做工不幾天，就要討老婆。」而討老婆要三百元才辦得到，而特派員每月的生活費不過三十元，於是接

⁴⁵ 廖白泉：《龍喜鄉農民運動的興起》，中共長沙縣委黨史辦等編：《大革命時期長沙農民運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74—175 頁。

⁴⁶ 《中共番禺臨時縣委四月份給省委報告》（1928 年 5 月），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印：《廣東革命歷史檔案彙集》甲 32，第 98—100 頁。

⁴⁷ 以 30 年代的華中地區為例，家有良田 30 畝，才能供給兩個子弟入小學；家有良田 50 畝，才能供給一個子弟進城讀高小；家有良田 200 畝以上，才能供給一個子弟讀中學。引自汪一駒：《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臺北，楓城出版社 1978 年，第 156—157 頁。

⁴⁸ 參見蕭邦齊著，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⁴⁹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海陸豐革命史料（1920—1927）》第 1 輯，第 138 頁。

⁵⁰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104 頁。

受農友的「禮物」，實際等於受賄。⁵¹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農友為什麼會給特派員送「禮物」，顯然是特派員具有相當的政治權勢。農運特派員既可利用其權力「尋租」，自然也便於開展農民運動。鄉下農民對城裏人，本來就懷有幾分敬畏心，更不必說來自省城有特派員頭銜的「衙門委員」了。中共廣東區委的報告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次陳炯明的親屬派了許多弁兵到鄉間收租，該鄉因為遭了大水大風的災，農民沒有租給他們，去的兵士本是海豐人，當即說廣州話去嚇農民，農民很恐慌，相率逃避。」⁵²說省城話也能嚇唬農民，頗見當時農民對城市人的畏懼心態。對特派員來說，這樣一種畏懼，既可成為受農民排斥的因素，也可轉化為令農民敬重的契機。從農運特派員向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報告看，更多的是後者而非前者。

在農運過程中，農運特派員有時會通過與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或省當局的關係，尋求支援。在廣東農運的幾次大規模衝突中，農運特派員請求廣州中央派軍隊援助農民，得到廣州中央的應允出兵。農運特派員「在報告中說了許多許多的如何危險的話，催促政府趕快出兵。」⁵³農民看見特派員能搬來政府軍，自然對特派員更加信任。

在湖南耒陽，曾組織百餘人分派九個「農運指導團」下鄉（這樣的「農運指導團」，可以說是後來土改時期「工作隊」的前身）。有一位指導團成員在報告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他們來到該縣石嘴鄉，發現「該地的群眾有多半在土豪劣紳手裏，因為以前縣農協有一特派員，不明當地情形，對於革命民眾貧農及失業農民，稍微打擊了一下，因此革命民眾不敢起來，領導權就被他們拿去了。我們到那裏的時候，不客氣的打擊土豪劣紳，促使以前被打擊的革命的農友——貧農及失業農民[幹起來]，於是反革命的土豪劣紳也就逃之夭夭，革命的空氣也就膨脹起來了。」⁵⁴這一案例反映了農運如何因特派員和農運指導員的干預而起伏。

特派員下鄉發動農民運動時，一般都擅長「造勢」，如成立區、鄉農民協會時，特意召開隆重的開幕典禮，讓地方黨政機關與各團體派代表參加，參會人數有時多達一兩千人，會上，自己代表中央或省黨部授旗授印，發表演講，會後組織群眾性遊行，高呼口號等，從而在民眾中擴大農民協會的影響。

⁵¹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104、109頁。

⁵²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42頁。

⁵³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67頁。

⁵⁴ 龍宣：《耒陽第二農運指導團下鄉工作的報告》（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474頁。

有意思的是，廣東團委在指導農民運動工作時，特意提示說：「農民協會之關防及佈告，應比官廳宏偉輝煌，令農民易於注意，而暗中形成一無產階級未來之新國家——政府。」⁵⁵這顯然是利用農民對官廳的敬畏心理，提升農民協會的地位。

農民運動講習所與特派員機制，可以說是北伐時期中共開展群眾運動的一大創制。特派員的正式身份雖然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或各省國民黨黨部所委派，其實絕大多數特派員是中共黨員，實際受中共的指揮。如中共廣東區委的報告中提到，「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的特派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們同志。」⁵⁶中共湖南區委的報告也提到，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派出的農運工作人員，約百分之九十是本黨同志。⁵⁷

按理在國民黨控制的省區，完全可以通過行政系統或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建立農民協會。而中共一開始即有意撇開既有的行政權力系統，讓黨團員以特派員的身份直接深入鄉村基層，然後自下而上建立農協組織，另立一套組織系統來動員群眾。在湖南，先後派出的農運特派員多達 400 餘人。⁵⁸而湖南的農運也最為活躍，最終導致各級農協組織幾乎取代了縣以下的政權系統。據柳直荀描述，到 1927 年 5 月馬日事變前，湖南實際已形成「工農專政」的局面，「城市中的工會，鄉村中的農民協會，簡直是當時第二政府」。⁵⁹

統治權在城市中確已轉到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因為工會與農會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兩種對峙的統治權——工農兩會的統治權和所謂省政府的統治權。但省政府的統治權僅是達到省政府所轄的各機關，而各機關並沒有能力去執行政務，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請工農兩會通告各級工農會才能發生效力。⁶⁰

特派員機制，本是中共尚未掌握政權情況下的一種群眾動員機制，而後在抗戰

⁵⁵ 《團粵區委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廣東農民運動決議案》（1924 年 6 月），《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第 7 頁。

⁵⁶ 《廣東農民運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55 頁。

⁵⁷ 《中共湘區一月份農民運動報告》（1927 年），《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458 頁。

⁵⁸ 夏曦：《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湖南政治黨務報告》（1927 年 3 月 12 日），《湖南農民運動資料彙編》，第 239 頁。

⁵⁹ 直荀：《馬日事變的回憶》（1928 年 5 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第 445 頁。

⁶⁰ 直荀：《湖南農民革命的追述》（1928 年 1 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第 374 頁。